

合肥市政协学习与文史委员会 编

合肥文史资料

统 战
人 士
专 辑



责任编辑 吴松保
装帧设计 余 杰

合 肥 文 史 资 料 第十八辑·统战人士专辑

编辑出版 合肥市政协学习与文史委员会
(安徽省合肥市荣亨达大道15号 230001)
激光照排 安徽图腾计算机公司照排部
制版印刷 合肥中建彩色印刷厂
规格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150 千字
版次印数 1999年11月第1版 2000册

书号:皖内图(99)—88 定价:10.80元

目 录

我的母亲龚维蓉·····	项有彬(1)
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记何谦堂·····	无 边(7)
绿色王国不倦的创业者——记吴翼 ·····	莫宇林(11)
一位值得工商界怀念的人——褚石谷 ·····	廖石安(23)
风雨同舟见真情——记刘璧城 ·····	尚 青(26)
教坛仍留盛名在——记万晏南 ·····	无 边(29)
忆父亲万选初 ·····	先 虞 先 广(35)
襟怀坦荡 淡泊名利——记王铸之 ·····	谭福翰 孙曙康(42)
树高千尺 叶落归根——记罗园仙 ·····	国 雄(50)
孜孜以求 奋斗不息——记冯宏谦 ·····	李晓军 沈松林(59)
外科专家余志义 ·····	卞华玉(63)
视教育如生命——记孙靖松 ·····	范耀骧(66)
路遥知马力——记张秉令 ·····	韩子英(73)
昂首红旗一放歌——记刘秉钧 ·····	文 梓(80)
党的诤友唐南屏 ·····	周 军(88)
丹心素志老弥坚——记冯纪云 ·····	谭福翰(93)
为统一战线工作尽心出力——记高泳田·····	韩子英(100)
张善瑞的“望六”与“忘六”·····	周 军(106)
拳拳报国心——记周翠梅·····	卞华玉(112)
不用扬鞭自奋蹄——记李海·····	陈锡银(117)
咬定青山不放松——记李晓枫·····	刘晓惠(123)

良师益友高国裕·····	晓 度(131)
情系政协 献计出力——记蒋永康·····	孔宪超(137)
他有一颗永远年轻的爱国心——记曹步萧·····	吴松保(142)
爱国情未了——记潘钧祥牧师·····	薛连喜(147)
爱国爱教的高僧——记妙安法师·····	单蓝田(151)
一片丹心育英才——记徐云青·····	周吉人(155)
老树春深更著花——记王道平·····	谭福翰(161)
一腔热血 耿耿忠心——记董光升·····	孙曙康(165)
彩印人生当不悔——记俞光华·····	舒世勇(171)
不灭的红烛——记方立吾·····	周吉人(175)
红枫霜叶晚更红——记许有为·····	萧 啸(182)
不倦献身畜牧事业的人——记张振亚·····	李晓军(193)
胜海法师传略·····	单蓝田(196)
后记·····	(198)

我的母亲龚维蓉

项有彬

我的母亲龚维蓉去世已经 17 年了，她一生追求进步，紧随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远是我们一家人学习的楷模。

反帝反封建的热血青年

母亲出生于 1900 年，成长于军阀混战时期，眼观列强分割中国的侵略行为，虽居官宦家庭，却反帝热血沸腾。当日本侵略者残杀我革命志士于济南街头，造成震惊全国的济南惨案时，正在济南师范学校读书的母亲义愤填膺。她不顾家庭、学校的反对，和同学们一道走上街头，进行反帝反日的示威游行；露宿于日本驻济南领事馆前绝食抗议，义卖字画捐给死难者家属。

当时，母亲与许多青年认为，只有走科学救国的道路，才能摆脱国家与民族挨打的局面，为此她考取了山东女子医学校。此时，母亲已结婚生子。母亲靠着顽强的毅力与坚韧，在校苦读七年毕业后，随着丈夫携两个孩子回到故乡合肥。为了摆脱封建礼教的枷锁，供应孩子上学读书，她不顾丈夫和婆母的反反对，经同学介绍来到合肥基督医院做起实习医生。这家医院是美国教会办的，用的是英文。母亲在学校学的德文全用不上。为了便于工作与交流，她白天看门诊、查病房、进手术室，晚上还要补习英语、看管孩子读书，成天忙得要命。加上实习医生没有工资，生活只能依靠陪嫁时一些首饰变卖维持。有时父亲还前来吵闹，甚至

推翻桌子，要她回到农村。而母亲则含泪忍耐，力求独立，让我们兄弟在城里读书，直到第二年升为住院医师，每月才有十块钱工资。经过努力，到抗战前她已成为全科性的主治医师。

国破家亡 誓不低头

1937年日军入侵中国，次年5月合肥沦陷，父亲、祖母相继死于农村。在国破家亡的恶劣形势下，母亲没有苟且偷生，甘当亡国奴，而是先把两个儿子送到大后方求学，而后自己带着医院分给她们的医药、器械，和几位医护人员冲过沦陷区，徒步500里来到当时的安徽省临时省会立煌县（现为金寨县），开设合肥基督医院立煌临时诊所，重新开始了治病救人工作。可是就在医院业务蒸蒸日上期间，日军在1943年1月扫荡大别山，火烧立煌县城。母亲跑反回来后，面对一片灰烬泪流满面，这时她已是一无所有、有家归不得的难民了。但生性倔强的她又抬起头来，决心从头干起。她借住病人家过道，白天出诊行医，步行10余里从不叫苦，脚走肿了用热水浴浴，继续为人看病，慢慢地她的医术得到了良好反映，报纸上的鸣谢启事多起来了，收入增加了，又在那里盖起诊所，恢复到往日忙碌景象。直到抗战胜利后方回到合肥接收基督医院。

认清方向 迎接光明

如果说母亲前半生是在苦难中挣扎过来的，尝尽了人间百味，但在关键时刻她却能够认清形势，迎接光明，让子女在大浪淘沙中去追求进步。我清楚记得，1948年冬天，当我和未婚妻董善涵从南京回到合肥家中时，母亲脸上堆满笑容。她热切希望我们留在身边一起迎接光明。可是，当晚上听到我们要去山东参加

革命时，她沉默了，然后慢慢地抬起头来说：“去吧！男儿志在四方！”她强忍着内心的亲情别离痛苦，为我们整理行装，望着我们踏着皑皑白雪走向远方，而自己却孤身一人留在合肥。当地换新换，新中国建立后，我们从山东经上海调回皖北日报工作时，母亲仿佛一下子年轻了10岁，眉头舒展开来。她高兴地说：“我从来未看到有像共产党干部这样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现在国家是有希望了，我们大家一齐好好干吧！”此时她已是50多岁的人了，但工作起来仍是生龙活虎，上午门诊，下午查房，有时手术至晚才归。业务上她精益求精，在简陋设备情况下为病人做腹部手术，为妇女摘除30多斤重的卵巢肿块，使一些患有白内障的人重见光明，这在解放初期的合肥医院可算大手术了。她还积极响应省妇联的号召，发动医院职工捐钱捐物，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经常参加各种会议，做好妇女工作，参加教会新成立的基督教三自革新委员会，与外国宗教侵华势力划清界线。

由于她立场坚定，工作热情，不久就被任命为省立和平医院（现省立医院）副院长兼外科主任。1952年皖南、皖北行署合并成立安徽省政府时，她不仅被推举为省人民代表、全国妇联代表，还被毛泽东主席任命为安徽省政府第一届委员。这些荣誉并没有使母亲沾沾自喜，而是感到责任更加重大。她说：“我过去工作只是对自己和病人负责，现在还要对党和政府负责。我不光要搞好本单位工作，更要跟上形势，完成党和政府交给我的其他任务。”为此，她在钻研业务的同时，还加强了政治学习，进一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经过学习，她主动提出退出基督教会，搬出解放前住的小洋楼，并主动要求减少薪水。她说我过去工作单位是教会医院，拿的工资较高；现在医院收归人民政府，我应该拿干部工资，与医院职工同工同酬。

在工作中她能根据需要，服从组织分配，到设备简陋的妇幼保健院，参加该院的初创工作，东奔西跑为产科病房安装暖气，为婴儿室增添保温箱，以保障妇女婴儿身心健康。她还连续担任省政协一、二、三届常委，积极参政议政，写了“采取措施，积极防止女工和农村妇女子宫脱垂疾病”的提案。甚至在70多岁的高龄时，还带领保健医护人员到长丰县农村开展巡回医疗工作，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接受考验 不要“三开”

母亲工作期间，正是国家政治运动频繁、知识分子连遭批判的时候。但每次政治运动她都能坦诚对待，接受考验。土改开始后，她就请在乡间的姑子把家中地契全部转交给当地政府，并附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件。她在信中说这些土地契约都是上辈遗留下来，我与子女都能自食其力，留下这些土地无多大意义，现全部转交给人民政府。土改可使物归其主，我举双手赞成。这样既可使农民有自己的土地，也可使我的子孙永远自力更生，真是太好了。她的信在当地土改大会上被公开宣读，受到热情赞扬。“三反五反”时，她虽然没有经济问题，却主动把自己在抗战时开诊所留下的少量医疗器械上交给单位。但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一生清白、勤奋工作的母亲还是受到冲击，遭受冤屈。当妇婴保健院的个别人领着四中红卫兵破门而入，抄走她一生积蓄时，她表示可以理解，群众运动嘛！一些过火行动是难免的。当保健院一些群众勒令她从长丰农村回到医院接受批斗时，她能平心静气说明问题，只是偶尔念两句毛主席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和“要文斗不要武斗”，使那些所谓造反派放下了手掌。在整个审查阶段，她住在阴暗潮湿的牛

棚，在专政队监视下打扫厕所、做棉花球等。每次当我们从窗外给她送点小菜，要她冷静对待这场运动、接受考验时，她总是睁开她那疲乏困惑的眼睛说：“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死也要死个明白，不要连累你们。”她虽这么说，但在内心却对这场运动中的许多事情总是想不通。有一次，保健院个别群众给她脖子上挂一块“三开分子”大牌子，押着她从长江路游向淮河路、六安路、桐城路，呼着口号打倒“三开分子龚维蓉！”。74岁高龄的母亲汗流浹背。事后她不解地问我什么是三开分子？我说这是江青说的，指的是有些人在国民党时吃得开，日本鬼子时吃得开，共产党时期也吃得开，所以叫“三开”。她听后激动地说，这太不像话，他们太颠倒黑白！我一生从没有参加国民党，也没有在国民党政府做过事，怎么叫吃得开？！抗战时更没有当过汉奸，怎么能说吃得开？！解放后，共产党要我当院长，毛主席任命我为省政府委员，就算是吃得开，跟共产党干革命也有罪吗？老人愤怒了，想不通。是的，江青之流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那黑白颠倒的时代，又有什么道理与伦理可讲呢？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粉碎“四人帮”之后，母亲没有再去工作，也没有回到医院居住，而是由我们夫妇把她安排在原合肥晚报社的一间办公室内居住，过起清贫生活。由于她的医术和医德一直在群众中有着很好的声誉，一些老病人、孕妇还是不断找上门来求医。无论是什么人上门，她从来都不推辞。她说别人找来了，是对我的信任，应该尽心竭力。凭着50多年的临床经验，她给病人做检查，用手给孕妇校正胎位，用手帕放在孕妇肚子上看胎音，既不收钱，也不受礼，耐心检查，反复讲解，总是使每一位患者和孕妇笑呵呵地

走出房门。她与许多病人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家人陪她走在街上，总有人与她招呼，向她问好，或站在路边讲个半天。就是到百货大楼购物也有一些营业员前来招呼，帮她挑选商品。这些事例时时教育着我们子女后代要关心群众，为人民服务，做一个高尚的人，有益于社会的人。

1979年3月1日，母亲参加省政协三届四次全委会。也许是太兴奋了，她感到浑身是劲。中午别人在午休，她却仍然戴着老花眼镜，耐住性子用颤抖的手在写提案。她忘记了自己已是八十岁高龄的老人，那缓慢的血流正在强力冲刺早已硬化的血管。兴奋使她忘记了过度疲劳，不料在吃饭时，突患脑中风，急送医院抢救。经过三个月的诊治，虽然神志清醒了，但却吐字不清，右手右脚也不能自由活动。她心里明白，如不锻炼将会出现严重的偏瘫。为了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她请人针灸、按摩，扶墙移步，顽强地坚持恢复锻炼，从不叫一声苦。组织上也给予特殊照顾，安排了干部病房，派来了特别护士护理。我们家庭更是全力以赴给予照料，几个孙男孙女轮流值班护理。出院后精心护理，为她定制了轮椅，推着她上街，去公园观光，去亲朋处闲语，使她看到市容日新月异的变化，看到人民生活越来越好。她高兴极了，常会从内心发出咯咯的笑声。

人终究是要老的，这是自然规律。在组织和子女百般照料下，母亲度过了八十二个春秋，于1982年秋安然离开了人世。

母亲逝去的消息在《安徽日报》上登出后，全国各地的唁电纷至，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等人也发来了唁电。中共合肥市委副书记丁之亲自为她治丧，老领导刘征田等100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在哀乐声中，人们怀念她，哀悼她一生清苦、治病救人，求进步、不断革命的精神，寄托着无尽的哀思。

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

——记何谦堂

无 边

原市农工民主党主任委员、市政协副主席何谦堂先生长期追求进步，参加革命，从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到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是本市爱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

何谦堂先生 1892 年 11 月出生于无为县城的一个塾师家庭。祖父何晴峰、父亲何裕如及叔叔均为地方塾师。何谦堂自幼即随祖父读书，1908 年入无为县立高等小学学习，1910 年毕业。父亲本欲送他继续升学，但因其祖父突然去世，家境一时陷入困境，只好辍学，在父亲的帮助下，于 1912 年秋在城关谋得一小学教师职位，并曾担任过城东初级小学校长。此后何谦堂又到多家坐馆，担任家庭教师。由于其尽心竭力，认真负责，因而教学效果明显，声誉日隆。1921 年，无为教育界前辈卢仲农先生的夫人潘世琳在无城创办县立女子高等小学，特聘何为学校教员。1928 年秋，柏文蔚先生在家乡寿县柏家寨创办寿县初级中学，闻何名久，多次派人来无为，聘何为教导主任。后校长柏月川（柏文蔚长子）病死，何实际主持了校务。

何谦堂的三弟何际唐 20 年代中期在芜湖上学时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长期在芜湖、无为等地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在其影响与帮助下，何谦堂思想日趋进步，同情与支持弟弟从事革命活动，并多次不惜重金解救其弟弟出狱。其长子何成也在叔叔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

1938年春,日本侵略军进占皖中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及游击队在皖中地区坚持进行敌后抗战。是年夏初,进步人士胡竺冰被推选为无为县县长,吕惠生任县政府秘书。为了支持与帮助在无为等地坚持抗战的新四军游击队,县政府设立四个货物稽征处以开辟财源,聘何谦堂为凤凰颈稽征处主任。

无为等地的抗日力量迅速发展,却引起了国民党桂系军阀李品仙的恐惧与忌恨。为了排挤和消灭无为境内的新四军游击队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1940年初,李品仙派大批国民党特务到无为,准备通过鸿门宴的方式一举逮捕无为境内的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吕惠生等人。许多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被迫逃离无为,何谦堂的弟弟及长子何成也被迫离家。由于其弟及长子的关系,何谦堂在无城处处受到监视,处境十分艰难,不得已,只得离开无城,到乡下担任塾师。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血腥屠杀新四军指战员。一部分新四军突围后来到江北,与一直坚持在皖江地区进行敌后抗战的新四军江北游击队会合,于是年5月在无为县西北蒋村宣布成立新四军第七师,继续坚持敌后抗战,并同时成立了由进步人士吕惠生任县长的无为抗日民主政府。次年改为皖中行政公署,并成立皖中参议会,何谦堂受聘担任参议员。1944年,何谦堂正式来到皖江根据地,担任根据地联合中学教员,并被推举为无为县参议会参议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当时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在皖江地区的新四军七师及其领导的皖江行政公署党政人员除少数人员留下来坚持开展游击斗争外,主力部队3万多人于1945年9月底至10月初分三批先后撤退往山东解放区。何谦堂未及告诉家人,就随大部队撤离了无为,先是撤退到江苏淮阴地区,在淮阴

停留一段时间后继续向北撤退，一直撤退到冀南的故城红庙。

新四军七师主力撤退后，国民党反动派就卷土重来，勾结当地土豪劣绅，疯狂屠杀、迫害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何谦堂的妹妹何瑞唐及原配夫人吴德芳先后被国民党逮捕，吴德芳最终被迫害致死。

1949年初，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原皖江地区的党政干部随解放大军南下，准备接管皖江地区的政府工作。3月，何谦堂随解放大军回到了安徽，5月被任命为合肥二中校长，重新回到教学岗位。暑假时，合肥学校布局调整，何又调任合肥一中副校长。

解放后，百业待兴，各地人才紧缺。1951年春，巢湖创办师范学校，组织上调何谦堂为该校校长，负责学校的筹建创办工作。何受命后多方奔走，积极吁请，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学校初具规模，教学管理逐步走上正规。孰料1953年省教委一纸指令，学校迁往西乡黄麓。由于黄麓地处边远乡村，教职员工多不愿前往，学校搬迁阻力很大。何以大局为重，反复动员，积极做好教职员工的思想工作，使大多数员工服从组织安排，随校迁离，学校得以很快恢复与发展。

1957年春，何谦堂回到合肥，任合肥师范学校副校长。次年年底被推举为市政协副主席、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并兼任市农工民主党主任委员。从1954年起，他还先后被推选为一、二、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一至五届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此时的何谦堂已年过六旬，但他仍然以旺盛的精力投身到工作中去。作为政府分管文教工作的副市长，他经常深入到学校、剧院了解情况，协调解决基层单位的困难与问题；作为人民代表，他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积极反映情况和提出建议；作

为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与政协副主席，他积极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团结各民主党派与各界民主人士，共同为国家建设献计出力。他生活俭朴，对自己及子女要求严格，处处注意自己的言行，不搞特殊化，因而在我市教育界和民主党派成员中享有较高的声誉。

1978年12月，何谦堂以87岁的高龄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来的夙愿。在支部大会通过他的申请时，这位经历三个时代的老人激动得热泪盈眶，详细地表述了他对党的认识，决心真正像周恩来总理那样“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

1979年8月，何谦堂先生在合肥病逝，终年88岁。

绿色王国不倦的创业者

——记吴翼

莫宇林

高级工程师吴翼与城市园林打了一辈子交道，对园林艺术无限痴迷，就连他家的客厅也堪称是个“微型园林”。且不说古玩架上精美的工艺品，也不说厅内摆设的盆景，单说东侧墙面悬挂的一幅近 10 平方米的彩色森林照，就让人如同置身于情趣深远的窗景：静谧幽邃的林间，透过浓荫，朝阳给小径洒上明丽的亮色；林边，一丛丛火红的杜鹃花正在盛开。它给我的感觉“象在野外一样”，吴翼说，言语间充盈着对园林艺术的殷殷深情。

人类的起源和发展得力于大自然，然而，人类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历史进程中，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又造成了对自然的摧残和破坏。如今，不满足于现有的城市生活环境，已经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人们在心理上、精神上“回归自然”的愿望日趋强烈。吴翼深情地说，城市园林正是以“回归自然”为出发点和归宿，为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营造一个舒适、优美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随着吴翼的娓娓而谈，笔者不禁想起了俄国作家契诃夫的一句名言：“他站在群山之巅，有不拔的意志，开阔的胸襟，远大的目光；他种下一棵树，就看到了千百年后的郁郁葱葱，这种人是可敬的。”吴翼不正是这样一位值得人们尊敬的人么？

在共和国城市园林发展史上，吴翼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辛勤耕耘，已硕果累累。

家庭是吴翼人生的第一课堂，父亲爱好花鸟草木情趣的熏陶，热爱祖国的谆谆教导，使他作出学习园林艺术的选择

1925年2月16日，吴翼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县的一户书香人家，远赴美国芝加哥留学的父亲吴蕴瑞得知喜讯后，给刚出生的儿子取名吴承芝。上初三时，吴承芝曾有志于报考空军，但未能如愿，一位亲戚建议他改名吴翼，以示纪念，也意在激励吴翼在人生的旅途上，早日展翅飞翔。

江阴县地处长江下游，是吴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人文荟萃，立德、立功、立言者累世不绝。吴翼的祖父是乡里一位受人尊敬的私塾先生。年幼的吴翼常津津有味地看着祖父上课，而在众多孙子辈中，吴翼又特别受到祖父的疼爱，只要一听到祖父“阿胖”的呼唤声，吴翼就飞快地跑到祖父身边，准定又可以吃到祖父给的糖果糕点了。

不久，吴蕴瑞从美国留学归来，受聘于中央大学，任体育系主任。吴翼随同全家到了南京。吴蕴瑞在教学之余，总爱在宅前的园子里精心呵护他的花鸟草木。松的永恒苍劲，竹的贞节虚心，梅的清标雅韵，菊的操介清逸等，都有各自的品性操守。渐渐地，吴翼也同父亲一样对它们百般爱护了。欣赏之余，吴蕴瑞还经常吟诗作画。在这种艺术美的熏陶中，吴翼似乎也品味到了“心中之一境界”的韵味。1943年，刚满18岁的吴翼，同时被中央大学农学院园艺系和交通大学财务管理系录取。吴翼最后决定学园艺，这不仅是因为他的理工科成绩一般化，吴翼回忆说，更重要的是父亲爱好花鸟草木的情趣，直接影响了他对专业的选择。

不仅如此，在引导孩子步入人生之旅时，吴蕴瑞还以浓浓的父爱培养子女的仁爱之心，在动荡的岁月中，更要他们懂得热爱自己的祖国。1931年，吴蕴瑞在东北大学体育系任教，全家住在沈阳。“九·一八”这天夜晚，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在沈阳上空乱窜。吴蕴瑞和他的妻子把孩子们召集到院子里，一边注视着漫天的杀人炮火，一边再三叮咛孩子们说：“要记住，这是日本鬼子的炮火！”在一夜忙乱之下，第二天清早，吴蕴瑞夫妇带领孩子们挤上了最后一趟开往北平的难民列车。“爸爸，我要喝水”，6岁的吴翼在车上吵着。吴蕴瑞向车窗外看了看，说：“你们呆在这儿，我去买点水就回来。”一会儿他的背影就消失在避战的难民中了。谁知道撕人心肺的汽笛声这时响了起来，火车慢慢开动了。正当全家人焦急万分的时刻，吴蕴瑞提着水瓶气喘吁吁地奔上火车，全家人总算落下了悬着的心，吴蕴瑞那沁满汗珠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容。

逃难到了北平，吴蕴瑞在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找到了一份工作。可是他的几箱心爱的书籍却在紧张的离乱中丢失了。吴翼说，这是父亲一生最大的损失，多少年之后他仍然跟我们提起这件令他痛心的事。“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南京，他们全家又随南京中央大学逃难至四川重庆。日军飞机轰炸山城、屠杀中国人的情景，吴翼至今还记忆犹新。

回忆起50多年前的这些往事，吴翼说着说着热泪盈眶了。1983年，吴翼曾出访日本。吴翼说，中日两国人民理当世代友好下去，但是，日本侵华的那段历史是不应忘记的。他说，在访日期间，我不曾主动伸出手去同日本友人表示亲切，在感情上似乎还难以转过这个弯来。

听完这些叙述，也就不难理解，吴翼为什么在大学读书时，